学术专论

清代满语文在达斡尔社会的传播进程探析

金　鑫

[摘要]　早在与后金（清）政权建立贡市关系之初，达斡尔氏族显贵即开始学说满语。康熙初布特哈打牲部落组建，通晓满语文成了达斡尔官员群体的必备技能。康熙中叶，在清廷满化政策推动下，满语文在黑龙江驻防八旗达斡尔军户中率先普及。受布特哈归隶黑龙江将军，继而被改组为呼伦贝尔、布特哈八旗影响，乾隆中叶满语普及到整个达斡尔族。晚清满语文在全国式微，但在达斡尔社会却依旧盛行。

[关键词]　清代　满语　满文　达斡尔　传播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0）－03－0054－009

有清一代，满族的语言、文字备受推崇，享有“国语”的尊隆地位。尤其是在清朝崛起的东北地区，满语文更是长期作为唯一的官方语文而存在，于民间亦颇为流行。早在崇德年间，达斡尔人即为清廷征服，康熙以降又被陆续吸纳入黑龙江驻防八旗。在官方的有意推布以及周邻满族人口的长期影响下，清代满语文在达斡尔族社会广为传播。以往学者们从语言学、文学的角度出发，对后世达斡尔语中的满语借词、晚清达斡尔文人以满文完成的诗歌作品，还有以满文为蓝本创制的民族文字进行过细致的整理、研究工作。① 但因史书方志中罕有记载，至今尚未能将清代满语文在达斡尔社会传播的具体进程梳理清楚，并就其普及程度做出令人信服的匡估。针对这一状况，笔者特以档案史料中所见满语、满文在达斡尔族官民间的行用情况为依据，对满语文在清代达斡尔族社会传播的基本脉络及其背后推动因素做一考述。

[收稿日期]　2019-11-25
[作者简介]　金鑫（1982—），男，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呼和浩特 010070；jinxin821223@163.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清代索伦兵研究》（19BZS131）。

① 代表性成果有朝克：《达斡尔语中的满—通古斯语借词》，《民族语文》1988 年第 4 期；丁石庆：《论达斡尔语中的满语借词》，《满语研究》1990 年第 1 期；恩和巴图：《谈满文字母的达斡尔文》，《民族语文》1994 年第 2 期；恩和巴图：《〈满达词典〉研究》，《满语研究》1994 年第 2 期；丁石庆：《论清代“达呼尔文”的历史文化价值》，《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 年第 3 期；郭蕊：《清代“达呼尔文”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丁石庆：《清代达斡尔语言与满汉文化》，《满族研究》2008 年第 2 期；吴刚：《达斡尔族“乌钦”考论》，《民族文学研究》2011 年第 3 期；吴刚：《达斡尔族满语书面文学述论》，《满语研究》2017 年第 1 期。

一

天命、天聪年间，以建州女真为主体的后金政权，为弥补对明战争中的人员消耗、垄断貂皮贡赋之利，不断征讨、招抚松花江、乌苏里江、黑龙江下游一带的野人女真诸部。为其兵威所慑，居于黑龙江中上游地方的一些达斡尔氏族部落亦很快与后金建立起通贡互市关系，而恰恰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部分达斡尔族的显贵人物便已开始接触、学习满语。

天聪八年（1634）五月，精奇哩氏头目巴尔达齐，“率四十四人来朝，贡貂皮一千八百一十八张”，① 旋为皇太极招为额驸。次年四月，塞布奇、噶尔达苏、戈博尔、额苏里、何里岱、克殷、吴鲁苏、榆尔根、海轮、固浓、昆都轮、吴蓝等十余个达斡尔城屯聚落的代表，在巴尔达齐的带领下来盛京朝觐。当月十九日，巴尔达齐、其兄鄂谟、其弟额讷布先期抵达，皇太极先命礼部承政满达尔汉于盛京城外五里迎接，“以我方待女婿之礼，照例杀牛迎迓，给予饮食诸物”（musei hojigosi doroi fe an i ihan wame okdo, jetere jakabe fe an i buo），继而在五月初九日又于宫中亲自宴请巴尔达齐、额讷布。② 六月间，朝觐队伍全数抵达盛京，除向皇太极进贡貂皮外，复以所携各色贵皮毛与后金官方进行了互市交易。据后金的互市差员们描述：“此前来送貂贡之人，俱系将彼等原有暴戾之心弃于其居地而来，估定貂价时，贸易之人不似先前一般执拗，俱能礼让我辈。”（ere sekei alban benjihe niyalma, ceni da furu ehe mujilen be gemu ini bade waliyafi jihebi, sekei hūda salibure de, hūda jihe niyalma nenehe adali majige hono mararakū , gemu muse de anahabi. ）③ 由上引档案不难发现，以巴尔达齐为代表的达斡尔族显贵人物来盛京朝觐，既可与汗王亲贵饮宴酬酢，也可与贩夫走卒讨价还价，似乎并不存在语言不通的障碍。时在黑龙江下游地方，有萨哈连、萨哈尔察、虎尔哈等诸多与建州女真语言相通、相近的野人女真部落分布。天聪八年十二月，皇太极遣霸奇兰、萨穆什喀等征讨虎尔哈时，就曾说：“此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携之而来，皆可以为我用。”④ 达斡尔人与这些野人女真部落居地相邻，长期交往，自然对其语言并不陌生，因而掌握起后金方面的满语来也并不会十分吃力。

崇德四、五年间（1639—1640），清朝最终出兵征服了整个黑龙江中上游地区，随之强迫所有达斡尔族的城屯聚落，都要逐年赴盛京朝贡，并与户部差来的库使进行皮张互市。此后，不仅是与清廷过从密切的巴尔达齐等少数头目，达斡尔所有氏族的“穆昆达”（mukūn i da 族长）均已改由清朝官方委任。出于解贡进京，领受朝廷政令，同互市差员间联络的客观需求，他们也一律都要学说满语。崇德七年，达斡尔族鄂嫩氏头目齐帕，于贡貂途中为人劫持，独自逃赴盛京告状。⑤ 崇德八年，达斡尔族德都勒氏头目科约布鲁被族人攻杀，直接原因就是皇太极口谕其“使尔之族人往这边，迁来索伦之地。如有不愿迁徙而叛逃者，则杀之。”（sini mukūn i urse be ebsi solon i bade guribu. gurire de cihakū ubašara ukandarangge bici, wa. ）⑥ 由这些事例来看，当时达斡尔族的上层显贵之中，应不乏熟练掌握满语者。

---

① 《清太宗实录》卷 18，天聪八年五月丙戌。

②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旧满洲档》第 9 册，海天印刷厂有限公司，1969 年，第 4217-4219、4254 页。

③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旧满洲档》第 9 册，第 4304-4305 页。

④ 《清太宗实录》卷 21，天聪八年十二月壬辰。

⑤ 《将军萨布素为父祖有功之杜喇都拟补副总管事咨布特哈总管玛布岱》，康熙三十年七月初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见《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缩微胶片），康熙朝第 2 盘第 12 册，第 270-280 页。

⑥ 《理藩院为谕命详审贝伯、齐努争世管佐领员缺一案事咨将军衙门》，康熙四十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见《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9 盘第 8 册，第 196-221 页。

二

顺治年间，沙俄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达斡尔人南迁嫩江沿岸避乱，旋于康熙初年编为牛录，与比邻而居的索伦、鄂伦春、毕喇尔诸部同组“布特哈打牲部落”。布特哈打牲部落是中央理藩院直接监管下的半自治藩部，建有以四员总管及其衙署为中枢，下设扎兰、牛录两级社会组织单位，以及副总管、佐领、骁骑校、达噜哈、领催等各级官吏的完备行政体系，其社会事务管理的方方面面均渐为清朝官方力量所介入。出于日常公务处理的客观需要，熟习满语、识认满文遂成为达斡尔族官员群体所应掌握的一项重要技能。

因最初主要是同理藩院、周邻扎萨克蒙旗相联系，蒙古文一度在布特哈打牲部落内流行。当时该处所行用的律法，就是理藩院以蒙古文编订的《蒙古律书》。① 康熙二十五年（1686）配给布特哈总管的两员随印笔帖式，亦是由理藩院从京城八旗官学生内挑选兼通满蒙文者充任，其中选者乌兰岱、巴当分别为蒙古正蓝、镶蓝旗人。② 由以上情形来看，早期出任布特哈总管的达斡尔人，如博吉勒岱、孟额德、洪吉、倍勒尔、玛布岱等，均应是通晓蒙古文的。除蒙古文外，满文也是当时布特哈打牲部落诸总管所必须掌握的。《达呼尔、索伦源流考》即节录有康熙二十四年洪吉、倍勒尔致理藩院的一件满文呈文，以及康熙二十八年玛布岱、倍勒尔致清圣祖的一件满文题本。③《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所存布特哈划归黑龙江将军管辖前，其总管致将军衙门的各类公函，更无不是以满文写成。为便于同总管衙门联络，同时也为在谋求升迁时获得优势，学习使用满蒙文字在扎兰、牛录基层官员中也渐渐流行开来。康熙三十年六月，在议定已故总管倍勒尔遗缺的补授人选时，掌印总管玛布岱推荐给将军萨布素的鄂伯图、花勒泰、布勒吉乌勒、阿尔斌、昆都勒德依等候选佐领，就是“均知文字”（gemu bithe sambi）。④

迁居嫩江流域后，随着与中原内地间直接经济联系的建立，达斡尔族的商品经济得到一定程度发展，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亦随之趋于复杂。受此影响，一般民众也越来越需要有文字来作为记注事务、表达思想的工具。由于本族旧无文字，时在东北关外通行的满文自然成了达斡尔平民学习使用文字的首选。档案中早在康熙前期，便已有达斡尔民间行用满文的例证。康熙二十三年，达斡尔人苏都礼曾以“书信”（jasiha bithe）的形式，将自己的休妻想法告知岳父吉噜雅。⑤ 这是满文作为信息交流工具，走入达斡尔百姓日常生活的明证。赴官府鸣冤诉讼时开写状纸，当时在达斡尔人中间也同样并非罕事。康熙二十七年，瑷珲城达斡尔披甲爱苏、讷尔贲图，赴黑龙江将军衙门告发布特哈牲丁图罕缠、伊锡莫早年央求他们代服兵役之事。将军萨布素向布特哈方面通报案情的咨文内，就有“爱苏之状纸内开”（aisu i habšaha bithe de）、“讷尔贲图之状纸内开”（nerbentu i habšaha bithe de）字样，这说明二人的诉讼请求均应是以状纸的形式向官府提出的。⑥ 书信也好、状纸也罢，均有倩人代笔的可能。但接下来的两则事例，毫无疑问地说明，时在达斡尔民间确实不乏通晓满文之人。康熙三十一年五月，有巴尔虎蒙古牲只为

---

① 参见金鑫：《清代达斡尔、鄂温克两族所适用的法律》，《满语研究》2013 年第 2 期。

② 《将军萨布素、总管玛布岱为蒙古笔帖式任期已满请遣人更代事咨理藩院》，康熙三十年六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见《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3 盘第 2 册，第 33-36 页。

③ 花灵阿：《达呼尔、索伦源流考》，孟志东编著：《中国达斡尔族古籍汇要》，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7 年，第 43、49 页。

④ 《将军萨布素为商定补授总管人选事咨布特哈总管玛布岱》，康熙三十年六月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见《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2 盘第 12 册，第 233-235 页。

⑤ 《将军萨布素为可否将在京当差达呼尔苏都礼之妻退还与其岳父吉噜雅事咨刑部》，康熙二十三年（日期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见《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1 盘第 1 册，第 79-81 页。

⑥ 《将军萨布素为审理爱苏等替人披甲一案事咨布特哈诸总管》，康熙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见《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1 盘第 8 册，第 55 页。

卦勒察人盗走，将军萨布素曾命布特哈“将两名识字、明白之人挑为使者”（bithe sara getuken juwe niyalma be elcin tucibufi），派赴该部居地交涉。[①] 同年十月，萨布素奉旨为新建的齐齐哈尔副都统衙衙门挑选笔帖式，中选的正红旗布勒哈岱牛录下披甲鄂阔卓、镶红旗多勒托依牛录下闲散沙晋二人，均是新近自布特哈编入该城驻防八旗的达斡尔人。[②]

三

康熙二十三至三十年间，布特哈打牲部落内约 1800 名达斡尔男丁，连同家眷一同被吸纳入新组建的黑龙江驻防八旗，编设为 28 个官兵牛录，分驻于瑷珲、墨尔根、齐齐哈尔三城。为使之尽快地融入八旗社会，清廷自达斡尔官兵编设伊始，即大力地对其推行满化政策，而学习掌握满洲人的语言、文字，又恰是该政策的重中之重。

隶属于驻防八旗下的达斡尔诸牛录，直接处于满族的黑龙江将军、各城副都统的监管之下，其佐领、骁骑校必须通晓满文，方能高效便捷地办理军务，甲兵亦须熟悉满语，才能准确无误地奉行军令。因此，教习满语文遂成为黑龙江将军衙门训练新编达斡尔官兵的重要内容之一。康熙三十一年，将军萨布素在一件公文内明确说自己正在教导墨尔根城的达斡尔、索伦新兵改从满俗，“俾之学说满语”（manju gisun gisurebume tacibure），并要求齐齐哈尔城副都统衔玛布岱予以仿效。[③] 时黑龙江驻防八旗的兵力配置，凡有达斡尔、索伦与满洲、汉军同处一城者，均是将双方牛录混编为旗，而在达斡尔、索伦集中驻扎的地区，也总是尽量多设满洲人出任的协领、防御等监管官员。这一方面固然有防范新兵的意味，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便于带动达斡尔等族新兵习学满俗、满语。对满文在驻防八旗达斡尔人中间的推广传播，黑龙江地方官府也同样颇为着意。八旗官学教育体系形成以后，尽管布特哈、呼伦贝尔的达斡尔人长期被排斥在外，但瑷珲、墨尔根、齐齐哈尔各城所属达斡尔 28 牛录，却始终享有与满洲、汉军旗人相对等的教育权利。[④] 相当数量的达斡尔学童，长期在官学中以满文为媒介来习学古奥艰深的经史学问，不仅显著地提高了诸城所属达斡尔族众的识字比例，更使其满语文的应用能力得到快速提升。康熙四十一年，布特哈满洲籍总管觉罗恩图，曾因所属满洲无品级笔帖式不通当地诸族语言，而请求将军将该缺补授与齐齐哈尔正红旗达斡尔贴写鲁穆德依。[⑤] 此例表明，当时驻防八旗下的达斡尔读书人，对于满语文掌握的娴熟程度，应丝毫不逊于同城的满洲旗人。

康熙三十年二月，在已抽调约半数达斡尔、索伦人丁入编黑龙江驻防八旗的基础上，清廷复将布特哈打牲部落的剩余人众全部划归黑龙江将军管辖。此后布特哈的政治地位，彻底转变成清中央直接治理的内属部落，而相应的文书制度变迁，复使满语文在该处达斡尔人当中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在降格为黑龙江将军辖下的二级行政区划后，理藩院与布特哈间的文书往来，由直接转为间接，凡事均须经将军中转。而随着其军政体制逐步向驻防八旗靠拢，参与布特哈事务管理的中央机构也不再仅限理藩院一家，六部、京旗都统均与之建立起一定的归口管理关系。受此影响，布特哈总管衙门在文书使用方面，便由以往的满蒙兼重，过渡到了满文独尊的

---

① 《将军萨布素为遣人赴卦勒察部交涉巴尔虎牲只失窃案事咨打牲达呼尔佐领》，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初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见《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3 盘第 11 册，第 176-179 页。

② 《将军萨布素为报知齐齐哈尔城四员笔帖式补放人选事咨吏部》，康熙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见《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3 盘第 13 册，第 324-325 页。

③ 《将军衙门为教索伦达呼尔习满洲法度、语言事咨齐齐哈尔副都统衔玛布岱》，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见《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3 盘第 6 册，第 132-133 页。

④ 参见金鑫：《康熙朝黑龙江八旗官学教育释疑》，《满族研究》2012 年第 3 期。

⑤ 《吏部为达呼尔鲁穆德依补布特哈满洲笔帖式员缺仍须请旨事咨将军沙纳海》，康熙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见《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10 盘第 8 册，第 119-120 页。

局面。旧有的两员蒙古笔帖式，即于康熙三十三年被裁撤回京。由于将军时常会越过总管衙门，直接向布特哈所属各扎兰、牛录下发公文，而一员总管额缺又固定地交由满洲籍官员充任，出于日常公务往来的实际需要，该处达斡尔族的中下级职官，便也需要像其总管们那样熟练地掌握满语文。上文提到的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征用赴卦勒察部交涉使者的命令，就是以公文的形式下达到布特哈达斡尔佐领齐诺、鄂绰尔处的。康熙三十八年，为配合朝廷钦差调查黑龙江故地达斡尔旧城屯分布状况，将军衙门曾直接致函布特哈讷莫尔扎兰达斡尔副总管花勒泰，要求其在纳彦、莽乃诸屯寻访知情人。[①] 这些事例说明，当时布特哈打牲部落下达斡尔族副总管、佐领各官，应普遍具备了处理满文公文的能力。满文在布特哈地方民间的行用程度亦再有提升，开始用以订立交易契约。如康熙四十年，达斡尔人德尔色肯的奴仆达噜、旺达外逃被抓获，官府办理遣返事宜的公文就提到这两名奴仆是“以白契购得”（bai bithede udame gaiha）。[②]

四

雍正年间布特哈打牲部落改编为呼伦贝尔八旗、布特哈八旗，最终融入黑龙江驻防军事体系之内。随着清朝官方对达斡尔人的控驭力度进一步加强，满语文在该族社会中的传播又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雍正五年至乾隆十五年（1727—1750），清廷先后在布特哈添设 8 员满洲副总管，最终形成每个扎兰或每个旗色下，达斡尔、索伦副总管，满洲副总管各有 1 员的局面。设置这些官员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便于“八扎兰之索伦、达呼尔俱得学习满洲礼法”（jakūn jalan i solon dagūr gemu neigen bahafi manju i doro giyan be tacimbi），[③] 即按康熙中叶对各驻防城镇中达斡尔、索伦新兵所做的那样，在布特哈地区的达斡尔等族人众中，亦推行以学满语、从满俗为特征的满化政策。而随着八旗军政管理体系的建立，以及地方经济社会的变化发展，布特哈、呼伦贝尔两处需以文书形式来处理的政务也在不断增多，举凡人丁比测、贡貂征解、俸饷发放、征派差役、请领恤赏、散发赈济、贷放官银，无不要形成大量的呈、咨呈、咨、札、甘结、清单、账册等各式公文，以及抄录汇集而成的备份档案。繁冗的文案工作，很快超过了官员的承受能力，笔帖式等各色专职文吏因之愈设愈多。康熙三十七年，布特哈复设两员无品级笔帖式，此后不断增设，至乾隆四十九年已达 8 员之多。因仍不敷用，总管衙门还有许多从兵丁中调来的兼差文员，如额委笔帖式、委笔帖式、贴写、“苏拉”[④] 等。各副总管、佐领身边，也同样出现了“外郎”“墨吉格”[⑤] 等文吏性质的侍从。受大量基层文吏职缺出现的有力刺激，在布特哈、呼伦贝尔地方，普通达斡尔百姓习学文字的热情也被调动起来，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民间私塾教育，掌握了基本的满语文应用技能。单就满语本身而言，至晚到乾隆中叶，就应已在整个达斡尔社会达到基本普及的程度。乾隆十三年冬，奉调参加征讨大金川之役的黑龙江官兵分起开赴前线。在商讨第十一、十二两起共 1000 名布特哈达斡尔、索伦官兵，与沿途所经各军需供应地间的联络

---

① 《将军萨布素为将乐克彻肯等人送来齐齐哈尔城事咨达呼尔副总管花勒泰》，康熙三十八年五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见《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7 盘第 16 册，第 128-129 页。

② 《布特哈总管觉罗恩图为将捉获逃奴达噜、旺达之谢银送往事呈将军沙纳海》，康熙四十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见《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朝第 9 盘第 16 册，第 264-265 页。

③ 《理藩院为谕命添设布特哈八旗副总管事咨将军傅尔丹》，乾隆十五年五月初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见《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乾隆朝第 41 盘第 12 册，第 160-163 页。

④ 满文作 sula，意为闲散，亦指衙署中的杂役。布特哈总管衙门内的苏拉，往往从识字的少年旗丁内挑充，除洒扫庭除外，还须协助文吏办理文案。服役数年，可升为贴写，并进而提拔为各级笔帖式。

⑤ 清代八旗牛录组织内，为佐领起草公文的书吏称为“外郎”，满文作 wailan。“墨吉格”是满文 mejige 的音译，为“消息”之意，又指为佐领投递文书、传布命令的小吏，汉文或译“传事兵”。

办法时，墨尔根城副都统黑雅图曾对这些官兵的语言掌握情况做过粗略调查，发现其中能说满语者至少有两三百人。[①] 乾隆二十八年，清廷自布特哈八旗迁调 1000 名官兵赴新疆永戍。次年三月，伊犁将军明瑞在奏折中提到，迁来的 500 名索伦官兵“其内有大半不解满语”（erei dorgi manju gisun bahanarakūngge amba dulin bi），至于 500 名达斡尔官兵则“俱为通晓满语之人”（gemu manju gisun bahanara niyalma）。[②] 布特哈地方迟至乾隆二十五年才正式派拨披甲额缺，在黑龙江全境各地与将军衙门间的关系最为疏远，此时随机抽调出如许之多的普通士兵，居然还能做到人人尽通满语，如此则其他各驻防城镇内与满洲人长期杂居的达斡尔人，其满语之精熟更是自不待言。本属蒙古语族的达斡尔官兵，其满语的掌握比例，居然能远胜过与满族同属通古斯语族的索伦，这也充分说明了当时达斡尔族上下各阶层对满语文的学习是何等的重视。

这一时期满文在达斡尔族民间的运用也更为普遍，除信函、状纸、契约外，还形成了定期编修家谱的习惯。入清以前，因无文字，达斡尔人的祖先世系、宗族渊源，全靠人们口耳相传，往往只能忆及七八代人之事。乾隆初，因黑龙江达斡尔世管牛录编设年久，袭职时亲族间易生争执，清廷要求其世袭佐领造具“根由家谱”（sekiyen i durugan），将牛录的编设原委及历任佐领的子孙世系开写明白，待佐领出缺时呈报与将军衙门及朝廷，以便辨清嫡庶亲疏，给补缺人选的确定提供依据。佐领根由家谱仅包含世袭佐领一个家支内的传承世系，并不将同祖的普通亲族列入。为便于辨明辈行，明确宗族成员间的权利、义务，受佐领根由家谱体式的启发，达斡尔人遂开始自行修纂整个家族、姓氏的大家谱。其通常为一横幅大纸，上端正中首书始祖名讳，下划横线一道，复于线下按兄左弟右顺序依次开列其诸子之名，以下第三、四、五等各代成员，也均如此类推。前面大多还附有序言，略述该姓氏的来历及迁徙原委。此类家谱始修后，一般每隔十数年就重抄续写一次，以便将新生儿添入。2015 年 1 月，笔者应邀翻译内蒙古莫力达瓦旗凯阔屯鄂嫩氏达斡尔人的旧传家谱。从其末尾交代的情况来看，这件家谱修于民国十二年（1923），而上一次编订则是在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前后间隔是 16 年。家谱中所列各个人物，如有官职、爵秩或迁居他处，也常会在其名旁侧加以注明。2010 年 8 月，笔者应邀整理黑龙江省讷河市莽乃屯达斡尔族郭布勒氏家谱，就于数人名下见有“驻防瑷珲”（aihūn de tebuhe）、“去了伊犁”（ili de genehe）、“在京城”（ging hoton de bi）字样。至于出任将军、副都统、参赞大臣、御前侍卫、协领、总管、副总管、佐领、骁骑校等职位，封授子、男、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尉、大夫、郎等爵秩，赐给翎顶、巴图鲁勇号之类的记载，在现存达斡尔各姓氏的家谱中，也同样比比皆是。在这些家谱中，人们不仅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达斡尔各氏族内部的传承世系及其彼此间的渊源关系，更能发现有关祖先记忆、清代人口迁徙流动、政治人物仕宦经历的珍贵记录，是研究清代达斡尔族社会发展形态、政治军事活动的重要文献资料。

五

迨至晚清，在满语、满文于全国范围走向衰败，甚至渐为满族自身弃用之际，达斡尔人却仍能相当广泛地学习、运用这一语文系统。

由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莫力达瓦旗档案馆所存“布特哈西路总管衙门”[③] 的档案文书可见，光绪末叶、宣统年间，在清朝官方已经全面改行汉文的情况下，该处发与黑龙江省府、周邻各城旗、

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0173-1003-21。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达斡尔学会、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达斡尔民族博物馆编：《清宫珍藏达斡尔族满汉文档案汇编》，辽宁民族出版社，2018 年，第 970 页。

③ 光绪三十二年，清廷将布特哈八旗辖境以嫩江为界分为东、西两路，各设总管一员辖制，东路总管驻博尔德屯（今黑龙江省讷河市）、西路总管驻宜卧奇屯（今属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

府厅州县的文书函件仍多为满文，至于总管衙门内部及其与所辖各旗、局、所、学堂等下属机构间的往来文书，则全部为满文。该处达斡尔族公职人员，上起总管、佐领、骁骑校等大小官员，下至笔帖式、贴写、外郎等一般文吏，也均是以满文作为日常工作中唯一的交际工具。时值清末新政，黑龙江省府传达与布特哈西路的汉文公函中，出现了许多反映近代社会新事物的词汇。为确保当地官民能够准确理解其含义，布西总管衙门的文吏们，还相对应地创造了不少新的满语词汇，诸如“宪政”（kooli dasan）、“共和”（uhe hūwaliyasun）、“自治”（beyei dasara）、“议会”（gisurere isan）、“师范”（sefui kemhen）、“公所”（siden falgari）、公益（siden tusangga）、“巡警”（giyarime kedere-re）、“警察”（kedereme baicara）等等，使垂死的满文在达斡尔族社会仍能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

受中原经史文化的长期熏陶，晚清时期渐渐有一些达斡尔族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本民族的史学、文学创作，而满文恰恰是他们表辞达意的首选工具。无论是成书于道光年间的《达呼尔、索伦源流考》（dagūr solon i sekiyen ulabun i bithe），[①] 还是光绪年间的《索伦、达呼尔族源考记》（solon dahūr aiman sekiyen be kimcime ejehe bithe），[②] 除夹杂有个别满文注音的达斡尔语词汇外，主干部分均以规范的满语文写就。文学方面涌现出的敖拉昌兴、玛玛格齐、钦同普等诗人，其所留下的母语“乌钦”诗歌，全都是以满文字母标音的方式写就，而且还往往夹杂着数量可观的满语借词。[③] 前述两部史著，在论证达斡尔、索伦出于唐代“黑水部”时，多处征引满文本《资治通鉴纲目》《续资治通鉴纲目》中的文句。至于乌钦诗作，凡遇说理规谏之处，也常常会举引典故。如敖拉昌兴的《过年》（anie），就有“极贫范丹竟何之？巨富石崇复何在？人之长寿称彭祖，昏沉倦怠早已逝。世间多计有周瑜，百无聊赖亦先休”（yadugui igeini fandan, yamar ga-jir iqsen? bayin ig shichong, bas haana aajaabei? nas orteini pengzu, nuaarj kejeeni nurxsen, arga walan zhouyu, agliirsaar kejeeni amarsen）等句，[④] 连续引用东汉不惧贫寒、守节终老的廉士范丹，西晋以骄奢淫逸、比阔炫富著称的权贵石崇，上古传说活到八百岁的彭祖，三国时英年早逝的东吴名将周瑜等四位历史人物，来慨叹人生的苦乐不均、寿夭无常，婉劝亲朋珍惜佳节团聚的快乐时光。这些事例说明，对清代达斡尔人而言，满语文不仅是与朝廷官府、周邻满族兵民间的信息交流工具，也是与内地汉族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中原的兴亡史事、典章制度、古今人物、诗词歌赋，藉此被引入达斡尔人的精神世界，并深深扎根在其心中，塑造着他们对中原古远历史与灿烂文化的认同情感，甚至于催生出与内地文人相近似的价值观念、风采情怀。随着满文音写达斡尔语文学作品在社会间广为流行，以满文为蓝本的民族文字创制亦于这一时期起步。光绪年间，达斡尔人顺泰模仿清朝官修的《清文鉴》，编写了一本《满、汉、达呼尔合璧词典》（manju nikan dahūr kamciha buleku bithe），内中所收达斡尔语单词，在拼写方法上趋于固定，在词形转化上也已有矩可循，基本达到了借源文字的应有标准。[⑤]

晚清时期，满文在达斡尔人日常生活中的运用也更趋普遍，满文与“苏州码子”相夹杂的独特记账方式的通行，就是其突出表征。苏州码子是一种便捷记数法，以〇、〡、〢、〣、〤、〥、〦、〧、〨、〩分别代表数字 0、1、2、3、4、5、6、7、8、9，可从上到下竖写，也可从左到右横写，前后以十进位递减，仍在数码行列旁附列一行字，用以表示十、百、千、万等数量级或两、吊等货币单位。在与内地汉商间长期贸易往来的有力带动下，晚清达斡尔人的

① 该书的基本情况见阿尔泰：《达呼尔索伦源流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 年第 1 期。

② 作者不详，全书约 5800 字，包括对索伦、达斡尔族渊源的考证，以及入清以来史事两大部分，似成书于清光绪中叶。该书目前仅在莫力达瓦旗档案馆存有民国时期油印本若干，至今在学界未有刊布。笔者于 2007 年 7 月在莫旗档案局誊录该书全文，自译其名为《索伦、达呼尔族源考记》。

③ 参见吴刚：《达斡尔族“乌钦”考论》，《民族文学研究》2011 年第 3 期。

④ 孟志东编著：《中国达斡尔语韵文体文学作品选集》上册，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7 年，第 309 页。

⑤ 参见丁石庆：《论清代“达呼尔文”的历史文化价值》，《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 年第 3 期。

商品货币关系得到充分发展。出于自身经济活动的客观需要，通过与汉商交往过程中的耳濡目染，当时的达斡尔官民相当普遍地习得了这种记数法，并与满文结合起来，广泛用以记录公私账目。今存《布特哈西路总管衙门档案》，有一本题为“光绪二十一年佟营总银两之所有支用、现存记录”（badarangga doro i orin emuci aniya tung kūwaran i da i menggun i ele baitalaha ne bisire ton i ejetun）的账簿，其中所列各项条目皆以满文标注，至于金额记数则一律使用苏州码。①《布特哈西路总管衙门档案》所存民国初年，宜卧奇、登特科、多音浅三个达斡尔村屯向红十字会（hūng šidzi hūi）捐款的字据，也是以苏州码记录金额，并留有“嘎珊达”（gašan da 村长）阿克敦布、盛忠、乐平的亲笔花押。②此例更可以说明，以苏州码记录账目的做法应该在达斡尔族民间早有流行。由于清末民初的达斡尔百姓大多不通汉文，所以民间在以苏州码记录账目时，往往要以满文译音字替代或标注出相应汉字量级单位的读音。如记录前宜卧奇屯向布西“警察所”（jing ca dzo）摊交柴草情况的单据中，就曾以满文 ce 来音写柴草的汉字计量单位“车”。③

晚清达斡尔族满文家谱的修撰，也出现了“族规”这一新内容。2009 年 4 月，笔者赴莫力达瓦旗额尔和乡宜和德村参加达斡尔族精奇哩氏续修家谱大会时，曾见一纸满文，上书 jingkiri halai fafun i bithe，意即“精奇哩氏族规”。该族规订于同治十年（1871），原纸下部缺损严重，大致有勒令族人凡事依从穆昆达安排、互相参加红白喜事、惩治凶悖不法之徒、禁止因私利而自相争执等内容。2016 年 8 月，笔者应莫力达瓦旗尼尔基镇杜德金邀请，翻译其家藏达斡尔族杜拉尔氏家谱时，亦发现有两件族规。其分别订立于道光十八年（1838）、光绪十年，保存状况较好，非但开列有各项禁行之事，还明确载有相应的惩罚措施。如晚辈辱骂、拳捣长辈者，应以柳条责打 15 下；续修家谱而不来聚会者，应责打柳条 10 下；族内女子若与“开档人”④结婚，其父兄须将之赎回，并宰杀大牲口宴请同宗亲属，当众磕头赔罪。就这两件材料来看，当时的族规都是在每次续修家谱时，由穆昆达、佐领或宗族尊长制定，并向大众宣读的。此类布告性的文书仍以满语文书写，说明清末满语、满文在达斡尔族人众中的普及程度仍是相当可观的。

结语

综上所述，最初满语文是作为一种统治工具而被引入到达斡尔族社会，其传播的主要动力是八旗军政体制的建立过程中清朝的有意推广以及达斡尔上层的仕进需求，而其流行范围也总是伴随着清廷对该族统治力度的不断加强而渐次拓展。起先是黑龙江故地时的少数氏族显贵，其次是布特哈打牲部落的各级官员，再次是编隶瑷珲、墨尔根、齐齐哈尔诸城的驻防官兵，最后是呼伦贝尔八旗、布特哈八旗的的游牧兵丁、贡貂牲丁，满语在达斡尔社会的传播终在乾隆中叶达到了普及的程度，满文也成为达斡尔人出任各级官员，甚至是基层胥吏的必备技能。随着南迁嫩江流域，被纳入黑龙江驻防八旗体系，达斡尔人与满、汉移民间的交往，与中原内地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变得日益密切，满语文作为族际交流工具的作用因之日渐凸显，成为达斡尔人与外界进行贸易交换，学习满汉习俗、儒家经史不可或缺的一道桥梁。接踵而来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又必然使达斡尔社会自身产生对于文字记注事物、思想表达功能的迫切需求，从而使满文在该族人众间的传播模式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习得，获得更大的发展动力，最终在晚清时期得以广为达斡尔普通民众所接受。

---

① 《布特哈西路总管衙门档案》，时间不详，内蒙古莫力达瓦旗档案馆藏，档案号：47-2-200-1。

② 《布特哈西路总管衙门档案》，时间不详，内蒙古莫力达瓦旗档案馆藏，档案号：47-2-760-2。

③ 《布特哈西路总管衙门档案》，时间不详，内蒙古莫力达瓦旗档案馆藏，档案号：47-1-793-14。

④ 满文作 dangse faksalaha niyalma，又称“开户人”，指为家主放出，自立户籍生活，承担及享有与正身旗人相近似的义务与权利的自由奴仆。参见刘小萌：《关于清代八旗中“开户人”的身分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7 年第 2 期。

References

Altai. “Dahuer suolun yuanLiu kao”(Review on the Book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Daur & Solon). *Neimenggu shehui kexue* (Inner Mongolia Social Sciences)1(1992).

Chaoke. “Dawoer yu zhong de man-tunggusi yu jieci”(Study on Manchu-Tungusic Loanwords in Daur language). *Minzu yuwen*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4(1988).

Enghebatu. “Tan manwen zimu de dawoer wen”(An Essay on the Written Language of Daur in Manchu Alphabet). *Minzu yuwen*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2(1994).

Enghebatu. “Man da cidian yanjiu”(Research on the Manchu-Daur dictionary). *Manyu yanjiu* (Manchu Studies)2(1994).

Ding Shiqing. “Lun dawoer yu zhong de man yu jieci”(Discussion on the Manchu Loanwords in Daur language). *Manyu yanjiu* (Manchu Studies)1(1990).

Ding Shiqing. “Lun dahuer wen de lishi wenhua jiazhi”(Discussion o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s of the Dahur script). *Heilongjiang minzu congkan* (Heilongjiang National Series)3(2001).

Ding Shiqing. “Qingdai dawoer yuyan yu man han wenhua”(Infulences of Manchu and Chinese Culture on Daur Language in Qing dynasty). *Manyu yanjiu* (Manchu Studies)2(2008).

Guo Rui. “Qingdai dahuer wen yanjiu”(Research on Dahur Script of Qing Dynasty). *Zhongyang minzu daxue boshi xuewei lunwen*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2007.

Jin Xin. “Kangxichao heilongjiang baqi guanxue jiaoyu shiyi”(Study on Unclear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Heilongjiang Province’s Eight Banner Official Schools during the Reign of Kangxi). *Manzu yanjiu* (Manchu Minority Research)3(2012).

Jin Xin. “Qingdai dawoer ewenke liang zu suo shiyong de falü”(Study on National Laws Ewenki and Daur Followed in Qing dynasty). *Manyu yanjiu* (Manchu Studies)2(2013).

Liu Xiaomeng. “Guanyu qingdai baqi zhong kaihuren de shenfen wenti”(On the Identity of the Separate-register Households of Eight Bannner in Qing dynasty). Shehui kexue zhanxian (Social Science Front Bimonthly)2(1987).

Wu Gang. “Dawoer zu Wuqin kaolun”(Study on the Wuqin Rap Art of Daur Nationality). *Minzu wenxue yanjiu* (Studies of Ethnic Literature)3(2011).

Wu Gang. “Dawoer zu manyu shumian wenxue shulun”(On Daur Literature Written in Manchu Scripts). *Manyu yanjiu* (Manchu Studies)1(2017).

Study on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Manchu Language and Script among the Daur Peopl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JIN X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College of History and Tourism Cultur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jinxin821223@163.com)

Abstract: As early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ibutary relationship toward the Later Jin Dynasty (Qing), clan chieftains of the Daur people began to learn the Manchu language. By the beginning of Kangxi era, as a result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Butha hunting tribe, knowledg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and script became a basic skill for Daur officials. In the middle of the Kangxi reign, promoted by the policy of Manjurification, Manchu language and script were popularized in military families of Daur which belonged to the Heilongjiang Eight banner garrisons. Influenced by the Butha hunting tribe, was put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military governor of Heilongjiang, and then recombined as Eight banner garrisons of Hulun buir and Butha, the Manchu language spread throughout the Daur people by the middle of the Qianlong reign. By the late Qing, Manchu language and script were declining throughout China, but the language remained in vogue among the Daur people.

Keywords: Qing dynasty, Manchu language, Manchu script, Daur, spreading